

我們不曾意識到，我們知道的竟是如此之少！

柏林國際文學節：十年奇蹟

瓜熟蒂落，果實欣然落地。
猶詩行落於紙面，亦是躡足而至，
忽而捉筆，揮灑而就，隨即消遁無蹤。
——法特·利夫卡

今年五月十四日，敘利亞詩人法特·利夫卡（Fuad Rifka）不幸辭世。二〇〇四年，他在柏林國際文學節上朗誦了這首詩。恰如詩中描繪，柏林國際文學節亦是躡足而至，瞬間竟已成現象。

至少，對於被文化消費嬌慣了的柏林觀眾，柏林國際文學節就是在眾多轟動事件的喧囂聲中悄然降臨的。

二〇〇一年六月，柏林國際文學節的後援會和彼特·魏斯基金會（Peter-Weiss-Stiftung）終於結束了長達數年的雜亂紛忙，以定規立範的長篇致辭拉開了首屆文學節的序幕。其未來規劃，卻是以一種詩歌預言的方式，由生於塞爾維亞的美國作家查理斯·西米克（Charles Simic）所作的演講「烏托邦及其周邊地區的氣象預報」勾畫了出來：幾乎整個世界及其想像，從沙塵暴到夏日雲海，一時間都湧向了柏林的上空。

如此抱負是必須的。從一開始，文學節就打上了狂妄的標籤，就被批為漫無頭緒、亂七八糟——其承辦人烏爾里希·施萊伯（Ulrich Schreiber）竭盡全力，就是為了將這種指責轉變為大量的讚嘆。在第六屆柏林國際文學節的開幕式上，約阿希姆·薩托略（Joachim Sartorius）用他一貫言簡意賅的優雅方式表達期許：「到了放手大幹的某個時刻，能力不足使人泰然。」當然，前提是，所有，也確實是所有柏林國際文學節的作家和活動本身確實可靠的高質量。在這裡，即使走錯了會場，你也不會迷失，因為這裡沒有電視主持人轉播足球賽時那種流水賬式的口若懸河，更沒有暢銷排行榜上的時尚垃圾、商業化的心靈雞湯或者民粹主義的狗血攻訐。烏爾里希·施萊伯和顧問們選擇作家的唯一標準，就是優秀文學的品質。

所謂品質，有一點不言自明，即優秀的文學作品擁有人性的光輝，擔當廣義而言的政治良心。熱衷講述軼聞趣事的的女作家伊莎貝·阿言德（Isabel Allende）曾說：「優秀的文學總是屬於異議者的。」但不是只有道德權威的說教，才能使你我成為更好的人，比如阿哈倫·阿普菲德（Aharon Appelfeld）、大衛·格羅斯曼（David Grossman）和曾任聯合國代表的沙希·塔魯爾（Shashi Tharoor）以及極富魅力的社會活動家阿蘭達蒂·洛伊（Arundhati Roy）所作的開幕致詞，抑或那些名為「反思」系列

的政治化的論壇討論。不，每篇小說、每篇詩歌、每一份對語言之美及其深刻所奉上的敬意，對了，甚至包括每個傻之又傻、傻到不可救藥的故事，都蘊藏著這種可能性。南茜·休斯頓（Nancy Huston）曾在二〇〇八年的開幕致詞中這樣解釋：「文明的頂峰上站著女性讀者，因為她們閱讀文學小說，從而學會了如何用他人的眼睛來看自己。」

對作家本人致敬，柏林國際文學節輕聲低調。當然，這裡還有詩歌之夜，吟詠之際，免不了激情四溢、縱聲高歌，加上數量可觀的名人嘉賓，蜂擁而來的粉絲們也不見得個個莊重肅穆。大江健三郎（Kenzaburo Oe）、納丁·戈迪默（Nadine Gordimer）、多麗絲·萊辛（Doris Lessing）、馬里奧·巴爾加斯·略薩（Mario Vargas Llosa）等諾貝爾文學獎得主，還有極具潛力的諾貝爾文學獎候選人、韓國詩人高銀（Ko Un）和近期惜別人世的詩歌女王英格·克利斯坦森（Inger Christiansen）以及她那不著邊際的集合論，都曾出現在亞克布·馬特納（Jakob Mattner）設計的純粹主義風格的舞台簾幕之前。此外，珍·柏金（Jane Birkin）帶給我們對於法國作家賽日·甘斯柏（Serge Gainsbourg）的淡淡追思，來自蘇格蘭的「硬核—愛情浪漫主義者」（Hardcore-Liebesromanikerin）AL肯尼迪（A. L. Kennedy）曾自嘲是女同性戀者的殯葬師，葡萄牙老貴族安東尼奧·洛博·安圖內斯（Antonio Lobo Antunes）引發了我們對後殖民罪惡的集體反思，蓬鬆亂髮的自由思想家麥可·翁達傑（Michael Ondaatje）鮮語寡言、嗯嗯啊啊，極端詩人恰克·帕拉尼克（Chuck Palahniuk）告訴我們抽煙是精神上的癮，還有那個喝著香檳的愛爾蘭作家馬修·斯威尼（Matthew Sweeney）曾在小吃店前，將一個行李箱滾動的噪音化作了音符。

最棒的事，莫過於完全陌生的人們帶來的驚喜。「驚奇吧！」——只要將斯特凡妮·埃塞爾（Stephane Hessel）的宣言「憤怒吧！」及其最新版本「投入吧！」稍作修改，也就是柏林國際文學節的口號了。這也是她最吸引人的地方，也就是不斷地推出明日之星。克拉克·麥卡恩（Colum McCann）、亞歷山大·黑蒙（Aleksandar Hemon）、提姆·帕克斯（Tim Parks）、莫妮卡·艾莉（Monica Ali）、卡米拉·莎姆西（Kamila Shamsie）、薩伊德·卡書亞（Sayed Kashua）、喬納森·薩弗蘭·福爾（Jonathan Safran Foer）、石黑一雄（Kazuo Ishiguro）、彼得·凱里（Peter Carey）、喬納森·勒瑟姆（Jonathan Lethem）、妮可·克勞斯（Nicole Krauss）、安特姬·柯洛葛（Antjie Krog）、弗雷德里克·貝格伯德（Frederic Beigbeder）、維克拉姆·塞斯（Vikram Seth）、弗蘭克·麥考特（Frank McCourt）、約書亞·費瑞斯（Joshua Ferris）、卡雷特·阿·卡米希（Khaled Al Khamissi）以及芬蘭—愛沙尼亞裔的「煉獄—女權主義者」蘇菲·奧克薩寧（Sofi Oksanen），他們都曾到場，和其他作家一起，而這些其他作家的名字我們即使想破腦袋也記不住。不過沒關係，誰知道將來，我們或許還能聽到諸如Rattawut Lapcharoensap、Natalia Sniadanke、Nicolta Esinencu或者Aka Morchiladze這些人的消息。無論參加了柏林國際文學節眾多活動中的哪一個，幾乎所有訪客，無不是一回到家中，

就有一卷在手的衝動。

在柏林國際文學節看起來雜亂無章的同步進行之中，讓人心曠神怡的就是其輕鬆的氣氛。上千名受邀至此的作家，無不誇讚其完美的組織、溫馨的幫助、美酒和令人感動的照顧，自然而然地，柏林國際文學節也被他們譽為世界上最好的文學節。

「不是每個人都有這樣的運氣，能經歷這樣一個面向世界所有作家、綜合世界所有文學種類、同時又能為詩歌與反思、白晝與黑夜、太陽與月亮提供舞台的文學節」，旅居法國的吉布提作家阿布德拉曼·瓦貝利（Abdourahman A. Waberi）曾如此寫道。參與柏林國際文學節對他來說，就意味著「獲悉我們的世界是圓的，而且正在轉動」。作為觀眾，我們能夠與他共同分享這份幸運感。

此外，柏林國際文學節另一個不容忽視的奇蹟，就是成功舉辦了十年之後，絲毫也沒有確立什麼。她至今依然漫無頭緒，一如既往地保持著充滿魔力的混亂。在眼花繚亂、近乎氾濫的節目單的背後，潛藏的其實是一份對未知事物的著迷和好奇。試想，如果就是為了著魔，為了讓自己心甘情願地被引誘到另一個世界，那為什麼還要看清全貌呢？

這種熱情俱有高度的傳染性，其源頭正是施萊伯先生本人。「人常常必須心懷混亂，才能誕生一顆舞動的星」，尼采的這句名言完全適用於他。他對外國文學和新作家的好奇心永無止境，著實令人嘆為觀止。他曾說：「我們不曾意識到，我們知道的竟是如此之少。」正是在他如此慷慨而謙卑的道白中，以非洲為主題的二〇〇八年柏林國際文學節拉開帷幕。其實，面對阿拉伯文學、亞洲文學、拉丁美洲文學，說穿了，面對一切文學，他都會作出同樣的真情告白，但同時，他又總能向我們證明，這個世界上的確還有如此精彩的未知事物值得我們去發掘。

這份無可救藥的熱情，年復一年，不可避免地傳染了他的由實習生和志工組成的團隊——他們在開幕典禮上排隊亮相的畫面已然就是文學節的標識；正是這份熱情，使他贏得了許多非傳統的贊助人——這類贊助也包括實物，會計們常常頭痛不已；也由於這份熱情，文化官員再無法忽視他，於是前來出席祝賀。文學，本就不是什麼時尚光鮮的產業。柏林國際文學節沒有高大上的接待，沒有時髦的派對，更沒有VIP盛裝晚宴。一張桌子、一把椅子、一個玻璃水杯，對於讀書活動已經足夠。剩下的，就是一個敘述者和一個聽眾，也許還要一個翻譯、一個演員和一個主持人。如果還要暖暖場，那就讓手風琴手艾達·甘烏霖（Aydar Gaynullin）拉幾個顛三倒四的音階組合（「月亮的饋贈」），或者讓西伯利亞吉他手阿雷斯·華格納（Alexej Wagner）彈上一段頗具詩意的音簇，或者就是簡單地敲聲鑼，也足以吸引聽眾的注意力。

從位於克羅伊茲貝格區的 HAU 劇場到米特區的病態劇院「索菲聽」（Sophiensäle），柏林國際文學節度過了四年流浪生涯，直到 2005 年，才於柏林匯演中心（Haus der Berliner Festspiele）找到了安身立命之處。這對雙方都是幸事，不只是因為場地主人愛

好文學，而是這座建於一九六三年的玻璃和細石混凝土建築曾經是畢斯卡特意義上的自由人民舞台（Freie Volksbühne），但隨著其所在的柏林西區繁華不再，建築本身也日漸凋敝。但是，它的主次舞台可以同時使用，而且，上下走廊都設有軟塌以及時髦卻不實用的吧臺，雖則不怎麼招人待見，卻都是十分理想的空間，用以容納亂紛紛的交頭接耳與自說自話。

在那美其名曰「納伯科夫咖啡館」的站立酒吧臺，擠滿了情繫歷史的人，雖然站得腿疼，也沒人開口抱怨。其他人則跑到帳篷里去。帳篷是為作家、工作人員、嘉賓以及那些不請自到的人設置的沙發休息區，也是柏林國際文學節最私密、最活躍的心臟地帶。絲絨沙發都快坐爛了，還一次次從道具間裡搬出來，供大家坐著喝贊助來的酒和咖啡，有人在這裡求婚，在這裡寫下故事，就是那種從不公开发表的故事。直到探戈音樂響起，這裡就是美國作家艾利特·溫柏（Eliot Weinberger）的駐蹕之地，也是「有點強勢」的伊莎貝·阿言德介紹她的丈夫的地方，說他剛剛完成了一部犯罪小說。這裡，不存在什麼美貌與權力、成就與財富，這裡有的，只是一個無階級差別的文學社會，而香煙與腦子裡的靈光閃念，在這裡都不屬於私有財產。

這就是柏林國際文學節的魂與魄，也是贈予我們每個人的神奇禮物。

十年奇蹟！



撰文：扎比娜·福格爾（Sabine Vogel）

翻譯：鄭燁

本文發表於《柏林匯演之書》，柏林匯演中心，二〇一一年，四十七至五十頁。正值約阿希姆·薩托略領導柏林匯演中心十週年之際，是為紀念。